

CLASSIC
现代学术
经典精读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经典精读

主编 李浩

高等教育出版社



西北大学研究生课程建设资助项目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经典精读

ZHONGGUO GUDAI WENXUE YANJIU JINGDIAN JINGDU

主编 李 浩

撰稿 杨新平 邵颖涛
邱 晓 王 伟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经典精读 / 李浩主编. — 北京 :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 1 (2017. 3重印)
ISBN 978-7-04-046477-1

I. ①中… II. ①李…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
究—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26379号

策划编辑 孙 璐
责任校对 陈旭颖

责任编辑 于 嘉
责任印制 耿 轩

封面设计 赵 阳

版式设计 赵 阳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4号
邮政编码 100120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50.5
字 数 830千字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咨询电话 400-810-0598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http://www.hep.com.cn>
网上订购 <http://www.hepmall.com.cn>
<http://www.hepmall.com>
<http://www.hepmall.cn>
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3月第2次印刷
定 价 88.00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 料 号 46477-A0

学术经典的文化使命

——“现代学术经典精读”系列丛书总序

张岂之

高等教育出版社组织编写一套“现代学术经典精读”系列丛书，邀请我写几句话。我觉得，通过高等教育出版社推出一些有新意的经典读物，有助于传承、弘扬和创新优秀的中华文化，我乐意承担撰写序言的工作。

中华民族拥有源远流长的文明史。中华文化凝结成为丰富的文化经典，亘古弥新，值得后来者不断发掘探讨。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有一系列类似的著作带有研究的性质，比如研究《老子》的《解老》《喻老》（见于《韩非子》），研究先秦诸子的《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吕氏春秋·不二》《尸子·广泽》《史记·论六家之要指》，后来更有系统探讨学术源流与道统的《伊洛渊源录》《近思录》《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等著作。这些成果一方面在梳理中国思想学术发展演变的脉络，另一方面在传承和弘扬中华学术精神，比如“和而不同”的学术精神，在中华学术史上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五千多年连绵不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文化传承与创新得以世代相传。这也叫做文化的“道统”，这个“道统”在今天应当发扬光大。

时至今日，学人们在学术园地辛勤耕耘，视野更加开阔，资料更加周详，方法

更加新颖，文字更加平实，形式更加多样，文风更加规范，所凝聚的学术成果，同样也是人们传承和创新文化的重要参考。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认为，高等教育出版社组织编辑出版“现代学术经典精读”系列丛书是有价值的。

当然，这不意味着本丛书所选著作、论文都是臻于完美、无以复加了。实际上，有研究经历的人都能明白，学术研究本是一个不断传承、推进的过程，不可能一劳永逸。在个人或团队的努力下，前后相继，共同促进学术的繁荣和创新，是学术研究中的常态，所以往往难以用僵化的思维去考量丰富多彩、不断发展的学术研究本身。这启示我们，面对现代思想学术史上的名著名篇，我们应尽可能发挥它们的榜样和示范作用；这些研究成果为后来者提供参考和借鉴，使它们在承传文化精神、创新研究成果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这意味着不能仅仅从研究形式或规范方面去估价这些成果，尽管规范和形式也是很重要的层面。

我有这样的体会：在学术研究方面，需要有包容与会通的精神，这样才能给新课题、新探讨提供可能，使学术的薪火能够代代相传。中国古代也很重视这种相互辩驳的学术精神和理念，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儒学案》的《发凡》中明确地指出：“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着眼理会，所谓一本而万殊也。以水济水，岂是学问！”

学术研究，文化传承，均要继往开来，不断推动学术创新与进步。中国古代学术著作，在梳理学术流变的过程中，侧重学术的继往开来，袭故弥新，“以复古为解放”（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穷本溯源，辨别考证，展现了学术研究的发展脉络和成果。正是这种订正增补，反复斟酌，使中华文化长河滔滔不息，绵延不绝。即使在民族遭遇重创的危急关头，中华文化中卓越的学术精神依然能够鼓励世人勇挑重担，成长为民族发展的脊梁。因为，学术研究和文化经典承载有不朽的文化精神，所以学术兴替往往被视作民族精神生死存亡的大事。因此，引导人文学科的研究生阅读以往的经典和名著，不仅仅在于丰富其专业知识，而且在于在潜移默化中使其精神受到优秀文化精神的熏陶，这将是更加重要的教育目标。

以上写了这么多的话，无非是想说明在学术研究作品的研读中，应注意凸现其中所隐藏的文化精神，以此作为大学文化传承和创新的基础。我想，对“现代学术经典精读”系列丛书的宗旨和意义应有这样的理解。

“现代学术经典精读”系列丛书，旨在向研究生传播文化知识和科研经验，提高研究生的学术鉴别能力和学术素养，为研究生以及青年教师从事学术研究提供帮助。

这套丛书内容涵盖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所涉文、史、哲、艺术等学科。每卷主编都是该学科领域学有专长的专家，选文尽可能突出学生必读的著名论文（或经典著作的节选），侧重20世纪的研究成果，其中不少是读者较难获得的论著。丛书编者希望所选论著大体上能反映学科研究的学术史体系，简要展现学科研究的发展历程、代表人物及其成果。前言由分卷主编撰写，主要介绍该领域学术史概况及论著遴选标准等，并对所选作品进行介绍和点评。每篇选文后附延伸阅读文献篇目。这使该丛书具有提纲挈领、扩展延伸的双重功能，编选应是有特色的。可见，高等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的这套系列丛书，经过深思熟虑，又有在人文学科方面具有丰富教学、科研经验的专家学者主持，不但有益于大学人文学科的建设发展，而且为大学在文化传承创新方面提供了一种实施的途径，值得支持。

在浩如烟海的现代学术作品中甄别筛选出有代表性的精华论文或著作，的确并非易事，也难以避免取舍失当的不足。希望这套丛书能为研究生和年轻老师提供文化和研究的滋养，也希望读者朋友能为本丛书的编写提供更多的建议和意见。

是为序。

2012年12月

目 录

001 / 试上高峰窥皓月——代前言（李浩）

总论篇

015 / 章太炎与《文学总略》

025 / 郭绍虞与《文学观念与其含义之变迁》

041 / 何其芳与《文学史讨论中的几个问题》

070 / 吉川幸次郎与《中国文学史的一种理解》

085 / 罗根泽与《战国前无私家著作说》

113 / 王瑶与《文人与酒》

诗词曲篇

137 / 程千帆与《古典诗歌描写与结构中的一与多》

162 / 闻一多与《诗经通义》

175 / 游国恩与《楚辞概论·总论》

206 / 王运熙与《论六朝清商曲中之和送声》

221 / 林庚与《盛唐气象》

244 / 胡小石与《李杜诗之比较》

253 / 陈寅恪与《长恨歌笺证》

294 / 钱锺书与《宋诗选注·序》

314 / 龙榆生与《研究词学之商榷》

331 / 唐圭璋与《两宋词人时代先后考》

341 / 夏承焘与《姜白石词编年笺校·行实考》

358 / 任中敏与《散曲概论》

文章篇

395 / 朱东润与《传叙文学与史传之别》

406 / 李长之与《司马迁的风格之美学上的分析》

465 / 刘师培与《文章源始》

474 / 黄侃与《文心雕龙札记·章句》

503 / 钱基博与《韩愈志·古文渊源篇》

戏曲篇

529 / 王国维与《唐宋大曲考》

564 / 周贻白与《中国戏剧与傀儡戏影戏》

593 / 青木正儿与《南北曲之起源》

608 / 王季思与《我怎样研究〈西厢记〉》

620 / 吴梅与《中国戏曲概论·明代》

小说篇

645 / 鲁迅与《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674 / 顾颉刚与《孟姜女故事的转变》

694 / 郑振铎与《水浒传的演化》

720 / 孙楷第与《三言二拍源流考》

745 / 胡适与《红楼梦考证》

779 / 阿英与《晚清小说的繁荣》

788 / 索引

795 / 出版说明

试上高峰窥皓月——代前言

李 浩

20 世纪的绿皮火车已风驰电掣地驶过去了，时而硝烟弥漫，时而轰轰烈烈，时而暴风骤雨，时而阳光灿烂。列车在咣当咣当声中抛洒下的遗留物既不全是一地鸡毛，也不全是金属银渣，需要清道夫打扫清理，盘点归类。这件工作很劳累很辛苦，也很琐屑很平凡，但这是下一班车出发前所必须做的。

我们通常喜欢将前一个时代留下的东西一律视作遗产。如果这个比喻能成立的话，那么想象一下，任何一个继承者都是富翁，既在物质上富裕起来了，也在精神上富有起来了，只要躺在祖先的这些遗产上不断地啃老、不断地挥霍就行了，何必还要创业创新呢？而实际情形可能没有那么简单和直接。或许，前代留下的仅仅是个账单，但究竟是正资产还是负资产，是赤字书写的还是墨字书写的，需要进行科学的资产审计后才能公布结果。

20 世纪同时留给我们的一则遗训是，这笔数量巨大的遗产，既不能照单全收，也不能一把火烧掉，而是要批判地继承，剔出其糟粕，吸收其精华。只是“批判”一语在 20 世纪频繁使用，词义复杂，且含有强势凌霸的意味，很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对此现象鲁迅在《拿来主义》一文中有过一段形象生动且经典的论述：

他占有，挑选。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只要

有养料，也和朋友们像萝卜白菜一样的吃掉，只不用它来宴大宾；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茅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却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虚。只有烟枪和烟灯，虽然形式和印度，波斯，阿刺伯的烟具都不同，确可以算是一种国粹，倘使背着周游世界，一定会有人看，但我想，除了送一点进博物馆之外，其余的是大可以毁掉的了。还有一群姨太太，也大以请她们各自走散为是，要不然，“拿来主义”怕未免有些危机。

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①

换一个稍具学理性、缜密性、中性的说法，批判的继承应该是学理性的论衡，创造性的转化。这也曾是宋儒对他们那个时代所面对的精神世界与知识谱系的基本态度：旧学商量，新知涵养。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明·杨慎《临江仙》）曾经亲历过20世纪后半期的人们，在新世纪的开端，又面临着另一个问题：将如何给更年轻的朋友述说20世纪的学术？

一

了解历史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美国历史学家威尔·杜兰特就曾经提醒人们：“历史嘲笑一切试图强迫将其纳入理论范式和逻辑规范的举动；历史是对我们概括化的大反动，它打破了全部的规则：历史是个怪胎。”^②这种感叹可能同样适应于20世纪的中国史，包括20世纪古代文学研究史。

回顾并记录20世纪学术演生的成果并不算少。一类是学界中人的个人记述，如

① 鲁迅：《拿来主义》，见《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41页。该文最初发表于1934年6月7日《中华时报》副刊《动向》，后由作者编入《且介亭杂文》。

② [美]威尔·杜兰特、阿里尔·杜兰特：《历史的教训》，中国方正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页。

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萧公权《问学谏往录》等；另一类是后学对前贤的记述，如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施议对《文学与神明：饶宗颐访谈录》、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后中国文坛纪实》等。另有一种是文学类的记述，如钱锺书《围城》、鹿桥《未央歌》、杨沫《青春之歌》、齐邦媛《巨流河》、宗璞《野葫芦引》（包括《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北归记》四部小说）、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饶佳荣译）、岳南《李庄往事：抗战时期中国文化中心纪实》和《南渡北归》等。这其中前几种是文学性的叙述，带有一些虚构；后面的几种是纪实性的，特别是易社强、岳南的纪实作品，时间跨度长，涉及领域多，场面宏大，过程复杂，让人读后五味杂陈，无法简单言说。此外，李怀宇《家国万里：访问旅美十二学人》记述留美学人的踪影，陈平原《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梅新林《战时学术地图中的古典文学研究高峰》等重在再现抗战时期古代文学研究的亮色，戴燕《文学史的权力》将文学史的编撰与话语权力联系起来，王钟陵《文学史新方法论》探讨文学史叙述的多种可能性，傅璇琮、蒋寅总主编多卷本《中国古代文学通论》尝试会通古代文学研究已有成果，董乃斌等主编《中国文学史学史》《文学史学原理研究》则将文学史的叙述上升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规划和研究。需要着重的一点，张燕瑾、吕薇芬总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共10卷12册，另配有张燕瑾、赵敏俐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论文选》10卷，统一策划，卷帙浩繁，是较早梳理归纳20世纪古代文学研究且有分量的学术成果。

检视20世纪的古代文学研究，过程虽然复杂曲折，但细节也逐渐清晰起来。总体看来，出现了许多新的面相和新的趋向。若按我个人的粗浅归拢，大致有四个趋势：从对旧传统的全盘否定到对文学遗产的区别对待，从文学经典的树立到学术经典的出现，从旧范式的突破到新范式的形成，从一元方法的依赖到多元方法的尝试。下面作简单的说明和解释。

首先说第一点，从对旧传统的全盘否定到对文学遗产的区别对待。新文化运动为了收到立竿见影的功效，一度对传统文学的态度比较简单化，我们从陈独秀、李大钊、刘半农、傅斯年、胡适、鲁迅等“五四”学人当时的论述，可以看出他们对旧传统的激烈态度。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对他们的言说环境、立论主旨以及文化斗争的叙述策略，应该给予“理解之同情”；但从今天的语境来看，能够很明显地看出他们言论的激烈和偏颇。为了整个知识界再次平和，回归理性，对前现代的文学遗产恢复常识认知，我们蹒跚地走了一百年。

其次说第二点，从文学经典的树立到学术经典的出现。前一个经典是指传统的文献文本，经过现代文艺理论的甄别选择后，被确定为新经典，并纳入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国民教育体系中，得以学习、传承和弘扬。新经典的范畴与传统经典的范畴，有交叉，有承继，但也有很大的差别。有的作品在旧经典范畴中，是作为经学的经籍，而在新范畴中，则是一般的文学作品。如《诗经》中的歌谣，《论语》《孟子》等中的语录体文章，《左传》中的叙事段落，过去都属于经和传，在旧的分类中是属于经部的作品。又如在旧的体系中，词是诗余，曲是词余，与主流的诗文是不能等量齐观的。还有曾被看作引车卖浆者之流的小说、戏曲，包括与昆曲相对的“花部”作品等，旧时也难登大雅之堂。20世纪以来，它们才被列入新经典的范畴中。这样看来，新经典要比旧经典的范围大得多，而且是开放的，“唐诗过去是宋词”^①，开放的经典大门不断纳入曾经被认为是通俗的流行的东西。

后一个经典则是指，对传统文本进行解读研究的文章、著作、讲义、教材。它们对于文学研究爱好者，特别是在学校、研究机构里专门从事文学研究的入门者，也有模仿借鉴的意义。本套丛书定名为“现代学术经典精读”，读的就是后一类经典，其所潜涵的价值和意义从这一名称上也可略窥一斑。易言之，20世纪以来，不光以现代文艺学的眼光确立了文学创作经典，也开始以现代学术的眼光遴选文学学术经典。从中国本土学术演化史来说，把这段历史拈出来特别强调，并不过分。

再次说第三点，从旧范式的突破到新范式的形成。传统的文学批评方式主要是诗话、词话和文话，再加上注释、评笺、笔记等。文章体的评论作品较少，著作类的评论作品更少。但随着现代学术机构特别是高等教育机构的建立以及现代科研院所的设立，更多样式的著述应运而生，比如刊登于报纸和学术刊物上的论文，学术会议上的演讲词与学术报告，大、中、小学等教育机构中的讲义和教材，研究型大学的学士、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和博士后出站报告等，形成了主潮。20世纪这些著述不光形式上与传统文类不尽相同，在学术理念、学术目的、学术要求、学术作用、学术规范上，也与前现代畛域不同。

王国维提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句话既包含一代有一代的文学创作，也暗含着一代有一代的文学观念和文学研究。但20世纪的文学研究，其比较对象的设定不是19世纪或18世纪，也不是清代或明代，而是整个前现代或古代，同时要建立

^① 葛兆光：《唐诗过去是宋词》，《读书》1994年第12期。

的是古与今、新与旧的比较模板和框架。由于 20 世纪的政治制度、教育制度、学术制度整个是横向移植的多，纵向继承的少，这也就决定了 20 世纪的学术研究理念与方法横向移植多于纵向继承。换言之，20 世纪文学研究的范式与古代有很大的差别。虽然研究对象可能仍然是唐宋诗词，可能仍然采用诗话、词话的形式，甚至仍然用文言写成，但是我们看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与宋元以来的旧诗话明显有差别，钱锺书的《谈艺录》与明人徐祯卿的同名作品有很大差别，他的《管锥编》也与顾炎武的《日知录》迥然不同，这些差别并不全在具体结论上，首先应该是在研究理念和研究范式上的。

最后说第四点，从一元方法的依赖到多元方法的尝试。这里所说的方法，既指古人所用的诗文研究法，也指现代学者处理古代文学现象和材料所使用的观念与技术。前现代时期，文学的样式与文体分类很复杂，文学创作的方法也很丰富，但作为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方法谈不上很多。20 世纪以降，欧风美雨飘来，作为现代学术谱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古代文学研究，其方法也日渐丰富。如梅新林《战时学术地图中的古典文学研究高峰》一文引用同行的成果，并特别提及抗战时期古代文学研究学术价值与启示意义集中体现在知识结构、学术取向、研究方法与创新追求四个方面。这对我们认识这个时期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很有帮助。

三是研究方法。与本时期古典文学学者群体的多重身份相契合，他们在研究方法上也是致力于跨学科的多向交融。薛其林在《民国时期学术研究方法论》（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一书中归纳为四大方法，即融合中西的科学实证方法、融合中西的义理阐释方法、融合中西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方法、融合中西的直觉体悟方法。其实还有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不能忽略，即融合中西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以顾颉刚、郑振铎、钱南扬、闻一多等为代表^①。以此参照抗战时期的古代文学研究方法，很少有学者单独运用某一方法，更多的是以上多种方法的交融与创新。值得重点关注的是，由于战时现实灾难的不断刺激，引自西方的社会学方法受到部分学者的重视，从刘大杰《中国文学史》引入法国丹纳的文学社会学批评理论与方法，到郭沫若、

^① 参见史伟《西学东渐中的观念、方法与民国时期中国文学研究——以人类学的输入为中心》，《古代文学理论研究》2013 年第 1 期。——原注

闻一多对屈原爱国精神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以及对《楚辞》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和巨大的思想价值的发掘，甚至如闻一多称誉屈原为“人民的诗人”^①，都集中体现了由考据学到社会学批评的学术走向，而在方法论上更接近于融合中西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②

尝试概括归纳古代文学研究方法的成果，在20世纪80年代后逐渐多了起来，如杜松柏《国学治学方法》、周勋初《当代学术研究思辨》、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赵敏俐《文学研究方法论讲义》、赵益《古典研究方法导论》等。为了教学需要，我也曾主编《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导论》，在其中专列一章讨论各种具体的研究方法^③，但感到无论如何枚举，都有挂一漏万之憾，所以我们只能以基于逻辑学、基于历史学、基于现代科技、基于哲学与美学、基于比较文化学、基于人类学与社会学、基于现代语言学、基于文艺学、基于传播学、基于音乐学等来简单提及。这自然也说明，新的研究方法越来越多，从一元走向了多元。

二

对于这一百多年来的古代文学研究，可以从以下三端进行梳理。

一是时间的视角。如大致可以分为鸦片战争后近代时期的古代文学研究、民国时期的古代文学研究、1949年以后的古代文学研究。民国时期又可细分为“五四”前后的古代文学研究、1927年至1937年十年时期的古代文学研究、1937年以后的古代文学研究。1949年以后大陆地区也可细分为五六十年代的古代文学研究、“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古代文学研究、新时期的古代文学研究、新世纪的古代文学研究等。

二是空间的视角。从大的空间上讲，有南方、北方之分。就1937年以后的研究而言，又有国统区、根据地和沦陷区的区分。就1949年以来的研究来说，也可有大陆地区、港澳地区、台湾地区和海外的区分。

梅新林曾借助抗战时期的学术地图指出古典文学研究的一些特点。例如全民族抗战爆发之前，全国学术地图的重心落在环东南沿海的东部区域，并以北平、上海、南京

① 闻一多：《人民的诗人：屈原》，《诗与散文》（昆明）1945年“诗人节特刊”。——原注

② 梅新林：《战时学术地图中的古典文学研究高峰》，《文学遗产》2015年第5期。

③ 参见李浩主编《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导论》（第二版）第8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

为三大中心而形成了东部学术“纵轴线”；抗战期间，东部大批教育科研机构陆续内迁，形成以重庆、昆明与汉中为三大中心的西部学术“纵轴线”。东西学术“纵轴线”的重心转移，直接影响了国统区与沦陷区学者群体的空间流布与人生抉择。就时空变局的趋势与节点而论，大致可以划分为整体内迁、逐步恢复、走向复兴、胜利回归四个阶段。^①抗战时期的学术空间确有内迁的主潮，形成“文化三坝”（成都华西坝、重庆沙坪坝、汉中古路坝）的说法；当然在沦陷区，例如上海，包括在租界中仍有学人坚持抗战，坚守学术。另外，抗战时期的香港也发挥了地理区位上的独特优势，学人弦歌不辍，教学科研仍在推进。1949年以来，台港澳地区也是古代文学研究的重镇，有特色的成果仍能不断出现。这是我们进行学术空间叙述时，不应该忽略掉的一些闪光点。

三是逻辑的视角。如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之“神”“气”说》、傅庚生《中国文学欣赏举隅》、刘大杰《中国古典文学中现实主义的行程问题》、董乃斌《中国文学史的演进——范式的视角》等。

与前面相呼应的，相关的研究成果也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类：

一是有关文学史的研究成果。这又可细分为通论文学史与断代文学史。前者如林传甲《中国文学史》，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吉川幸次郎《中国诗史》《中国文学史》，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周贻白《中国戏剧史长编》等。后者如唐圭璋编著《宋词纪事》，吉川幸次郎《宋元明诗概说》，赵景深《元明南戏考略》等。无论是通论通史类还是断代研究类，数量都较大，成绩也较突出。这与前述现代高校教育体制与人才培养方案有关。公立私立大学大多有国文系、中文系、文学院，其中的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汉语言文学专业）最基本的课程就是“中国文学史”。为了深化课程内容而编写的研究性著作或教学性教材如雨后春笋，应时而生。因了大陆的影响，台港澳地区及海外也有了编写、出版文学通史的热情，如近年台大出版中心将台静农《中国文学史》讲义编辑出版，很快上海古籍出版社引进推出大陆版。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组织翻译出版由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的两卷本《剑桥中国文学史》（可简称“北美本”）的同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也陆续推出由顾彬主编的多卷分体本“中国文学史”（可简称“欧洲本”）。

二是有关古代文学批评理论的研究成果。有关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主要体现

^① 参见梅新林《战时学术地图中的古典文学研究高峰》，《文学遗产》2015年第5期。